

外来宗教与近代长白山地区汉族移民的底层生活

孙玉龙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 吉林 通化 134000)

摘要: 近代传入的外来宗教, 由于与移民紧密联系, 不仅展现了移民的特点, 而且反映了汉族移民适应社会的地域特色。近代长白山地区汉族移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外来宗教的信仰, 包括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信仰, 这种信仰有其独有的特点, 并带有民族化的共同性。

关键词: 中国近代; 长白山地区; 汉族移民; 外来宗教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23)05-0153-05

与中原地区外来宗教发展情况不同, 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在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呈现出旺盛的景象。

一、长白山地区外来宗教与信众

(一) 伊斯兰教的传播

伊斯兰教的传入主要是伴随着回族的迁移而传播, 以回族信众为主, 但也有汉族移民信奉伊斯兰教。

《珲春市志》中记载: “伊斯兰教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宁古塔来珲春回民数人起, 到光绪年间人数渐渐增多。他们租房设清真寺, 并先后从宁古塔和吉林聘请教长, 任期3年。光绪初年建清真寺一座3间(占地面积30方丈)。1927年又建成清真南寺一座3间(占地面积49方丈)。随后, 南北两寺各有一名阿訇。南寺教徒多为开饭店、宰牛等人; 北寺教徒多为开皮铺、种地的回民, 各寺均有30来名信徒。”^{[1][160]}

《延吉市志》记载: “19世纪末, 随着回族垦民的迁入, 伊斯兰教传入延吉。宣统二年(1910年)前后, 清真寺建于下市(现进学街一居委址), 教徒几乎全是回民。”^[2]

《(民国)海龙县志》中记载: “海龙设治之初, 即有回教徒入境, 以山城镇最多, 山城镇西南隅因回族多故有回回营之称, 其礼拜堂亦在焉, 兼有一二杰出者在镇街颇有声势, 如张志朴、刘子恒等, 是其礼拜堂在民国十五年修改, 规模较大, 并创立小学校一处, 后因经费无着不能遵章改善, 旋归县方接办, 改称区立小学校。兹将回教状况分述于左: 山城镇伊斯兰教堂。由新京回教总会经营, 宣统元年三月设立, 教堂规模甚小, 后经刘子恒、马国龄购置地基, 建筑礼拜寺十五间。有会员四百二十七人。朝阳镇伊斯兰教堂。由新京回教总会经营之,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成立, 民

国六年建礼拜堂三间, 原名清真寺, 康德元年九月始更名曰伊斯兰教堂。设教长一人、经理一人、教徒二百十五人。海龙县城伊斯兰教堂。属于新京回教总会, 民国十八年十月一日海龙县城后西北隅建筑教堂, 以夏秀峰为教长。康德元年九月又改选石润溥为教长。有经理四人、会员若干人、教徒一百七十人。”^①

《(民国)辉南县志》中记载: “境内回教自民国初年传入, 盖其徒以土地日辟渐渐来居也。城中有清真寺一所, 阿訇主持其务, 回民环居之, 以牧畜屠沽为业, 婚姻非其党不与居室, 以红楮书回文颜其楣以示所信仰, 其于禽兽非反刍具蹠之类不食, 教规所在亦清洁之道也”^{[3][16]}。《(民国)辉南风土调查录》中也记述: “回教为天方教, 亦曰清真教, 本县有回民数十户, 皆经营饮食店及屠宰事业, 未立寺院会所。”^{[3][40]}

《(民国)辑安县志》记载: “境内者多以牧畜屠宰牛羊为业, 婚姻非其教不相结, 县境无教堂, 回民亦不多。”^{[4][13]}又记载: “境内多以牧畜屠宰牛羊为业, 婚姻非其教不相结。县境无教堂, 回民亦无多。”^{[4][12]}

由此可见, 伊斯兰教在长白山地区的传播较晚, 且布道的对象以汉族移民为主要对象。相较于基督教、天主教的布道, 伊斯兰教的信徒数量相对较少。

(二) 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

基督教(也称耶稣教)和天主教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直接布道来加以宣扬。清代中期在吉林省已经有外国传教士传教, 《(民国)桦甸县志》记载: “清代中叶由西方传入中国, 何时传入桦甸不详。”^②

长白山地区的基督教(也称耶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数量相对较多。

《(民国)海龙县志》记述: “光绪十八年始到海龙, 先

①白永贞:《(民国)海龙县志》[M].1913:10.

②贾明善,修.陈铁梅,纂.《(民国)桦甸县志》[M].1931:9.

收稿日期: 2023-03-18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以来东北移民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44—1945)”(17ZDA193); 2022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汉族移民与近代长白山地区文化关系的嬗变(1860—1949)”(JJKH20220504SK); 2022年度通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族群互动与认同重构: 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移民社会的建构”(2022001ND)

作者简介: 孙玉龙(1978—), 男, 吉林集安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东北边疆史、东北移民史、满族语言文化研究。

设天主堂于二八旦(今桦树村),继又在三八旦创立教堂,规模甚小,现已并移。”^①又记述:“清光绪九年美利坚人林化东到此创立教堂,现在仍为美人神父贵荆璞主持教务,教堂建筑宏壮,其左近教民亦多。朝阳镇天主教堂。于清光绪二十二年设立,教堂归抚顺总堂所属,民国十七年白司订归国,由满籍人陈日新继任。山城镇天主教堂。民国十八年经美人莫圣才司铎购置地基,建设教堂,归抚顺总堂所管辖,现有主教一人、分堂司铎二人、司事一人、布教三人,信徒二百余人。”^②“海龙设治较晚,清光绪十八年始有英人戴兴邦创设教堂,规模狭隘。光绪十九年由英牧师建山城镇基督教会。光绪二十二年英人雅格创设朝阳镇基督教会。”^③“清光绪十八年始到海龙,先设天主堂于二八旦(今桦树村),继又在三八旦创立教堂,规模甚小,现已并移。光绪九年美国人林化东建县城西桦树村天主教堂。光绪二十二年设立朝阳镇天主教堂。民国十八年美国人莫盛才建山城镇天主教堂。”^④

《(民国)辉南县志》中记载:“天主教传入本县百年左右,朝阳镇、长春堡各建教堂1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神甫陈德启主持在长春堡建教堂4间,当时发展教徒60人,其中男32人,女28人。……基督教传入本县百年左右,朝阳镇建有教堂1处,5间教堂,3间神职人员居室。”^⑤《(民国)辉南风土调查录》中称:“县境有天主教堂一处,在蛤玛河,草房十间,面积一百三十方丈,宣统元年成立,会长李永春,信教人一百七十二名。……县境只有一处在本城南街草房三间,面积九十方丈,民国二年成立,教士戴兴邦,耶稣教信教人一百二十名。”^⑥

《安图县志》中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德国人白化东来明月沟创立天主教教会,隶属延吉教区。1928年前后建明月沟天主教堂,占地3 000平方米,并创办海星学校、病院、神学院。初期教徒约50人,后发展到2 000余人。……民国七年(1918年)1月,由李允知等4人于李家创建明月沟基督教教会。”^⑦

《珲春市志》中记载:“1903年基督教英国籍传教士富士贡和朝鲜族基督教宣教师到珲春、大砬子一带传教。开始时在珲春城组织6户、10余人在私人家里设堂传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籍传教士牛凤岭在珲春租房传教,随着教徒的增多,于1906年12月设立了珲春天主教。传教人王嘉录、王成信。1908年法国籍传教士在珲春又成立一处教堂。传教人罗海山、陈忠义。同一时期,朝鲜元山教区由神父白化东巡回各地传教。在珲春敬信太平川(今六道泡)建立了天主教公所。又分别在莲花洞(今二道泡)、金塘、伐登(今玻璃洞)、池登坪(今圈河)、莎草峰(今防川)马川子乡电线、英安乡里化、春化东兴镇等地建立了天主教公所。1924年,朝鲜元山总教堂德国籍神父具杰根由敬信来珲春县城主持传教并办了教会学校。1928年,从朝鲜元山教区分离。成立延吉教区后,珲春教会及教会学校由神父白化东代管。1929年,由德国神父郑默德主持珲春教务。1931年全县有天

主教堂(所)17处,教徒912人。”^⑧

《(民国)辑安县志》记载:“本境内耶稣教教堂一处,在六区花甸子,教徒不多。……入其教者恒恒藉势以凌人,故乡民多恶之。境内无天主教教堂,其徒亦寥寥无几。”^⑨

《汪清县志(1909-1985)》记载:“清末,汪清县已有教会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具春光、郑禹由龙井迁来汪清县蛤蟆塘后河(原称大房子),组织基督教,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期间,汪清县百草沟、仲安乡的牡丹川、东振乡的柳树河、罗子沟镇的河南和太平沟、西崴子等地,先后有基督教会活动,信徒达780余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汪清县设立了基督教堂,‘长老教、监理教、圣洁教’三个基督教派合用一个教堂,隶属龙井教堂。其代表人物有牧师崔锡龙、金顺哲、长老崔世春、张元文、金淘洪,执事姜信宰、金汉旭、金享锡、崔南松。……民国四年(1915年)百草沟出现了天主教组织。民国四八年(1919年),原龙井传教师李达彦迁来汪清县蛤蟆塘大房子(后河),开始组织教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长春派来1名德国籍神甫,在蛤蟆塘大房子修建天主教堂,还设立了海星学校,占用耕地50公顷,发展信徒200余人。同时还在前河、五站、新兴成立了天主教会,此时全县有天主教徒500余人。后河传教师朴昌谦到南阳村,宣传天主教。”^⑩

《柳河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牧师由辽宁省开原县来本境传教。基督教创办小学1所,地方人王魁萱为校长。为时不到4年,信徒发展到400余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教堂被焚,教徒除被杀者外,大部分逃散。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传教者于柳河镇东后街典买民房17间,设立教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武赞亭来主持教务,李国库、李廷钧两人辅佐,不仅县城教堂略有发展,各较大村镇均建起教堂。民国初年,刘子元牧师主持教务,海龙基督教会胡治三赞助。教会有街基地30余亩,房屋67间,小学校3处,教徒260余人。教产房租年得小洋钱五六千元,供做教会津贴或其他费用开支。”^⑪“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天主教由海龙县二八石传入本境。柳河镇、亨通山子、六道沟建有天主教堂,信徒达500余人,遍及各地。亨通山子天主教堂较大,有土地96亩,房屋16间。当地高、喻、韩三姓全家入教,教徒300余人。民国十九年(1930年),全县有教堂3处,教徒200余人,有土地20亩,房屋30余间。”^⑫

《延边州志》记载:“中华基督教和耶稣家庭是汉族信奉的两大教会分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传教士杜荣本从吉林来延边传教,建立延吉教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4月,建立敦化教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建立延吉县平安村教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建立龙井教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立头道沟教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立珲春教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的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在营口召开会议。分立辽东、辽西、吉林3个

①白永贞:(民国)海龙县志[M].1913:12.

②白永贞:(民国)海龙县志[M].1913:13.

③白永贞:(民国)海龙县志[M].1913:10.

④白永贞:(民国)海龙县志[M].1913:13.

⑤王瑞之:(民国)辉南风土调查录[M].1929:40.

中会。延边地区的教会受吉林中会领导,到1920年,共有教徒300多名。1921年延吉教会在金德堂、朱希久发起下,由教徒捐款购买瓦房27间,为教会使用,当时延吉有教徒百人左右,后又请张宗耀为牧师,李克勤为长老。1921年1月,延吉教会创办私立新民学校。1931年延边地区的教会从吉林中会分立,单独建立延吉中会。1925年敬奠羸在山东泰安马庄创立,并自称“老家”。1933年山东老家派宋仁山来延吉传教,准备建立“家庭”,当时因延吉已有真耶稣教,未能实现其计划,只好暂时加入真耶稣教会。1934年11月,宋仁山到安图真耶稣教会任传教士。1940年宋趁和龙真耶稣教会的空隙,从安图去和龙,建立和龙“家庭”,这时已有100多名教徒。1943年宋回山东“老家”工农部受训,由刘耀廷、于大非、柳长春等人负责和龙“家庭”。1944年宋仁山从“老家”回安图,向真耶稣教会教徒宣传,1945年后安图真耶稣教会大部分教徒听信宋的宣传,转入耶稣家庭,教会也改名为耶稣家庭。”^[18]

《(民国)临江县志》中记载:“美国司铎徐恩来与孟副司铎于民国十七年秋来临,教友王青山、姜凤鸣协助之,于县城设天主公会一处,会址在中富街路南,创设正房十二楹,东西厢房各三楹,楼房十二楹。民国二十二年,徐孟二司铎、他迁贡司铎希贤继任,丹国人教友男女约一百八十人。……美国司铎徐恩来与孟副司铎于民国十七年秋来临,教友王青山、姜凤鸣等协助之于县城设天主公会一处。民国二十年徐、孟二司铎他迁,贡司铎希贤继任丹国人教友男女约一百八十人。民国十四年秋有丹国路德惠牧师名柏卫者自庄河县跋涉来临,筹款创修基督教会,会址位于县城文成街,牧师程占元,现有教徒四十余人。”^[19]又记载:“民国十四年秋有丹国路德惠牧师名柏卫者,自庄河县跋涉来临,总计筹款现洋15 010元,创修基督教会会址,位于县城文街西头路北,会地面积三十六方丈,修礼拜堂三楹,牧师府楼房三楹,钟楼一座,牧师程占元,现有教徒四十余人,赵之久先生为宣教士。由十四年视事,今已领洗其经典为新旧约全书,继有医士周湘泉创办幼稚园一处,附设该教会院内东厢课室二间,教员室一间,男女儿童约三十余名。”^[19]

《通化县志》记载:“我县宗教昔时仅有释道二教,海通以来,始有天主、基督之流入,至回教则传属回民他族无与焉。考天主、基督二教之设垂数十年,然以人民拘于旧习,信崇者为数尚少。……同治初法兰西人始传天主教于各省,而本境教堂在光绪年间成立,建于本城北山之麓,计房屋二十余间,当日教徒约百余人。因信徒太少,直辖于兴京教堂,每年由兴京派神父亲查一二次,但其神权尊严,无自由平等之乐趣,故人多畏之而不敢入云。……清同治时始入中国北部,其传至东省最晚。本境地僻边陲,人智锢塞,习俗迷信多神。清光绪二十一年有英人罗约翰牧师不惜跋涉之苦徒步东来,传播福音,莅通后尤不惜巨金,遂价买市房二十六间,昼夜宣讲,信徒颇众。复聘邢君子衡督理一切,乃竭力布道,计是年受洗教友百余名,记名教友五百余名,为基督教会极盛时代。庚子肇乱,教友流离,道路死亡泰半,而教会之房间业被焚毁净尽矣。光绪二十六年邢君子衡

复承会之使命,遣派来通,始于城内东关临时布道宣讲。宣统元年鉴于人民智识不开,乃创设义务女学校一所,学额达五十名。民国十三年该会聘请李兴仁服务社会,昼夜宣讲,施行平民教育、工厂教育,以便平民有所裨益。……清光绪二十一年有英人罗约翰牧师不惜跋涉之苦,徒步东来传播福音,莅通后尤不惜巨金,遂价买市房二十六间,共计费银壹百六十五两,昼夜宣讲,信徒颇众。复聘邢君子衡督理一切,乃竭力布道,计是年受洗教友百余名,记名教友五百余名,为基督教会极盛时代。后因拳乱,教友流离道路,死亡泰半,而教会之房间业被拳匪焚毁净尽矣。拳匪乱后,时局稍靖,三五同志拟从而恢复之,然兴工一载,而会务进行亦因之停止矣。清光绪二十六年邢君子衡复承两差会之使命,遣派来通始于城内东关十字街,租赁民宅五间为临时布道宣讲所。是年春季,由英国差会拨来巨款复加整顿,重新修理于秋,后建成瓦房三十一间,除本会占用外,尚租出市房二十余间,从兹考查道理者络绎不绝,乃邢君复热诚可钦,蒙其口讲指画而潜心嚮道者不下千余人。民国二年春季通化教会呈请英国差会脱离经济关系,遂在上海中华基督教总会备案,请准为中华通化基督教会,每常年经费均由该本会自筹矣。民国十三年冬该会又聘高级神学毕业生李君兴仁为牧师,李君自任职后热心服务社会,昼夜宣讲,不遗余力,每晚亲自施行平民教育、工厂教育,以便贫民有所裨益,故自该君到会,成绩颇佳,迥非天主教所能及也,此通化基督教沿革之大较也。”^[10]

二、底层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清末民初,外来宗教是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流入,在汉族移民生活结合之后逐渐形成的,外来宗教的传播开辟了长白山地区多元信仰的新局面。《(民国)朝阳县志》中记载:“汉族当日居若晨星,势若散沙,结合不易,智者于是而为香火会。初敛布施,以修庙宇。……借以御侮,减生危险。”^①在汉族移民聚居的区域内信奉的神祇庞杂。探究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可以为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的汉族移民研究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汉族移民社会的全貌。

(一)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特征

1.与生活紧密结合,没有定准,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一大显著特点

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很少是单一信仰,往往是多神崇拜。汉族移民并不是就宗教而信教,汉族移民所信奉的神灵往来源于生活,他们的信仰与生活紧密结合。无论哪种神灵,只要他们认为能够寄托他们的精神寄托,满足他们的理想和诉求,他们就会尊奉。汉族移民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明显的务实特点,信仰的宗教对信众的约束很有限,他们信奉多教多神。大多数汉族移民不是信某个单一的宗教,他们崇拜天地,信仰多神,供奉玉皇大帝、关公、刘备、十二元觉、如来佛、菩萨等等。《(民国)奉天通志》中记载:“所祭之神,则有天地、张仙、灶神、门神、观音。乡村公祭者,则有关帝、财神、苗神、土地、山神、马王、牛王、青龙、五道、火神等祠。东边各县,又有祭老把头,此汉族祭祀之大

①周铁铮:《(民国)朝阳县志》[M].1930:184.

略也。”^①《(民国)延吉县志》中记载：“与他教不同，至人民信奉神道之沿袭其所供者大都有观音、关圣帝君及皂王、胡仙四道。商众则供财神，烧商则供酒仙，剃头者则供罗祖真人，乡民近山者供山神，附林者供蟒神，赴境垦民则供白袍神(即唐时薛仁也)，又有礼教(诸云在礼)，人民为戒除烟酒起见，故多服从之，然既从而复出，可以自由，此外并无各种神秘教派。”^②汉族移民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多种信即无宗信，多信仰即无信仰。因而，在数量众多的汉族移民群体中，存在着多神崇拜的想象。很多寺庙在庙堂里供奉的不仅仅是一尊神像，有合祀的情况存在。在同一庙宇中，会供奉一尊神龛或者多座神龛。对于各路神灵，无论地位高低、性善性恶都一律心存敬畏，一以敬之。

《(民国)吉林新志》中也记载道：“省民所奉杂神，更仆难数。其主要者，为雷公、闪将、风婆、雨王、耕田牛马、害苗杂虫，及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丧门神等。……一委于神意。得驹三日，必祭马王。苗多害虫，则拜息虫王。而灶门。财诸神，则经年供之。家人失魂，则焚疏请皂王寻之。称一家之主焉。此外烧锅(酿白酒者)必供胡仙(狐之仙者)及黄鼬子，(住民亦多供此二者)恐其盗酒也。妇人屡产不生，则供张仙于室，谓能打天狗使不吃子也。又信风土卜筮之术。而许愿之风亦盛行。如因疾病旱涝虫灾等事，许某神以演剧、唱影、杀猪、修庙等重礼，因小儿病而许送替身是也。最不合理者为许小儿出家之愿。盖此愿一许则此儿一生不得返人世矣。其庙堂为：一为室内供奉。祖宗一先人，财神一掌财富，皂王一掌皂突，为一家之主，喜神一掌吉庆，张仙一打天狗免儿殇，佛一掌疾病祸福，门神一掌门禁免失盗，狐三太爷一义玛供之，黄鼬子一同上。二为院内供奉。天地一天然现象，狐仙堂—狐狸精，黄皮子庙—黄鼬子精，家庙—祖先，停柩—老人死而久不葬，停柩在院者。三为市村庙宇寺祠。土地庙—亦称山神每村至少一座，玉皇庙—玉皇大帝(俗称玉皇爷)，龙王庙—龙王，娘娘庙—子孙娘娘(俗称送神娘娘)，城隍庙—管城市居民之神(俗称城隍爷爷奶奶)如阳世之警察，吕祖祠—吕祖，关帝庙—关羽，孔子庙—孔子，姑子庙—住姑子(佛徒)，喇嘛庙—佛(喇嘛派，蒙人信之)，清真寺—回教，天主堂—耶稣，祠堂—一有功于民者，忠孝祠—一忠孝者，节孝祠—一守节妇女，喇嘛台—希腊教(惟哈尔滨有，俄人信之)，神社—神道教(新京之头道沟，日人信之)，佛寺—佛教，火神庙—火神，马神庙—马神。”^③

2. 宽容的态度和实用性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显著特点

汉族移民没有一个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秉持着兼容并蓄的态度，从实用功用性出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切实的利益。凡是走山者很多死于饥寒者，正是存在着危险，山民们才将神化的山东莱阳人孙良供奉为老把头，把山东人孙继高尊奉为开矿行业的把头始祖。孙良的开拓精神，孙继高的仗义行侠，灶王爷的尽职尽责，关羽的忠肝义胆，山神、土地、药王、龙王、苗神、虫神等

的统辖一方。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归属于自己行业的神灵，在经济活动较为落后的长白山地区有精神上的寄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还有的是希望能带来多子多福、前途平顺、财路宽广等帮助。很多因困苦却无钱医治的汉族移民很容易成为信徒。需要什么神灵就拜什么神灵，于是见庙就进，见神就拜，主要的信仰是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除了为生计疲于奔命外，汉族移民还通过宗教信仰来加强汉族移民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其日常生活。汉族移民的信仰表现在汉族文化自带实用主义鬼神观。《安东县志》中记载：“县境乡民所崇奉之神道，以山神、土地二庙为最多，凡有居人，必立是庙。或以砖，或以石，或以木，庙貌简陋无比。他若龙母、龙王、虫王、财神、娘娘等庙，以及合祀之七圣、九圣诸祠，每村必共建一所，虽祠庙之大小不同，其为人民所崇奉则一也。”^④汉族移民从实用主义出发选择信奉的宗教，于是就造成了“见庙就进，见神就拜”的奇特人文景观。

3. 穿越民族界限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突出特点

满汉族杂居，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渗透和融合，使得宗教信仰穿越民族界限。汉族移民不仅信奉本民族的宗教，也会信仰其他民族的宗教。在与汉族长期的接触中，满族的文化也参杂着佛教的思想。这种杂糅的情况源于佛教与萨满在思想上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很容易被信奉者所接受。随着移民文化的传播，萨满逐渐和佛教、道教相融合，形成了萨满与其他宗教的交融复合。在满族的文化作品中也不乏流露这种思想的。汉族移民把“多子多福”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恩佑，满族受到汉族移民的影响，很多人孩子取名janggimboo(汉译为观音保)、pusaboo(汉译为菩萨保。pusa为“汉语菩萨之音借”，“菩萨保”带有求菩萨保佑的意思。)、“满保”、guwaimboo等佛教化的名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中共录“菩萨保”字条38处，皆出自清代文献，且皆为满洲人名。可见，janggimboo(观音保)、pusaboo(菩萨保)、“满保”等是满族中很常见的姓名。

4. 将外域宗教信仰地方化、民族化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发展特点

正是通过与汉族移民文化的融合，外来宗教才得以在广大汉族移民生活的地区扎根发展。在汉族移民“来者多为其习俗每沿用故乡惯例，不失幽冀坚强、邹鲁朴厚之风”。^⑤在迁移的过程中，所到之处汉族移民都会将所信奉的宗教加以人为创造，在原有的宗教信仰中融入了民族的因素，使这些宗教信仰、仪式适应汉族移民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使得舶来的宗教信仰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信奉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人至神和由神至人的互构。汉族移民所尊奉的神灵往往是取自自己所熟悉的家乡神明，一方面，能够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另一方面，也基于相同的信仰能够构建起同乡之间的纽带，增强互信，这些信仰具有地缘性，如随处可见的关帝庙多为来自山西的汉族移民所建，八仙为来自山东的汉族移民所建，娘娘庙则多为来自山东、河北的汉族移民所建。在泰山上现存一民国十年立祈愿碑，碑文上书写：“吉林省滨江县瘟疫流行，死者不计

①王树楠纂，翟文选修。(民国)奉天通志[M].1934:1182.

②供人。(民国)延吉县志[M].吉林:吉林省馆,1914:41.

③[清]路云盖平县志[M].1909:61.

其数,见者注目寒心,有秦莱賈君联斌、郑君书箴等于斯生理,诚心祝祷,祈碧霞元君之灵应保佑苍生,不惟祷者俱无灾恙,祷后而瘟疫遂止。”^[13]虽然迁移到外乡,汉族移民仍然对原居地的信仰念念不忘,在与迁入地文化结合后形成了具有地方化、民族化特点的宗教信仰文化。

5.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明显特征

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是清末民初汉族移民的显著特征。汉族信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反映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文化现象。汉族移民信奉某种宗教,往往是人为的选择。这种非排他性的宗教信仰是汉族移民同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是兼容并包特征的外在表现。

(二)汉族移民宗教信仰多元的原因

1.对世界的敬畏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多元的根本原因

汉族移民没有民族性的全民族统一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强迫性的被接受信仰,能够接受宗教的原因是内心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敬畏,这种恐惧深深植入骨髓,成为了汉族移民信仰的核心。在迁移之后又和满族的天穹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信仰上的多元。汉族移民所信奉的主神并不统一,所信奉的神灵杂乱,是一种混合性的崇拜,大凡真实与飘渺的,皆被赋予某种神性,具有某种灵力。汉族移民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改造其教义,形成与本土文化相嫁接的宗教而加以信仰。汉族移民所信奉的不仅仅是宗教中的神灵,如观音、土地神等;也有历史上真正存在的英雄人物,如关羽;乃至还囊括了在迁移中涌现出的汉族移民群体中的真实人物,如采参和伐木的老把头孙良。他们所崇拜的神祇可以来自不同的宗教体系,乃至在一天之内的不同时段他们会祭拜不同的神灵。这种多元的宗教信仰本身囊括了巫术思想、鬼神观念、农业社会的祭祀仪式、宗教本身的教义以及唯灵是信的灵验观念等等。对神灵的敬畏不仅是为了庇佑自己和家人,而且这种信仰又和汉族移民所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采参、伐木等各行各业都有他们所尊奉的神祇。这已经突破了就宗教而信奉的单纯的信仰,形成了特有的宗教观。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汉族移民在信奉一种宗教的同时还会信奉其他的神灵,抑或在供奉的寺庙中供奉多个神祇的原因。体现出汉族移民信仰的多元性与功利性的特定。

2.实用性是汉族移民宗教信仰多元的直接原因

汉族移民一般没有固定的宗教崇奉,日常生活比较自由。他们信奉的往往不是象征性的神灵,甚至对信奉的教义也一知半解,在有心理需求的情况下往往临时抱佛脚式的采用“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的功利性的宗教信仰观。接触中,他们会观察是否灵验,他们会甄别哪些神灵对自己有益,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带来慰藉,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给人以超自然的希望,有助于帮助自己存活下来,庇佑自

己。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清末民初之际,这些神祇是获得来年丰收或者祈福的保障,这种宗教信仰已经完全融入到汉族移民的民族文化当中。《费孝通文集》里有一段民间信仰的论述:“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避祸。我们的祭祀很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衰乞。鬼神赐给我们的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14]这就使得汉族移民所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种工具,既能带来精神寄托,又能带来实际的效果,甚至自己认为信仰总会有些好处的。唯灵是信的灵验观念深刻地折射出宗教信仰多元的现象,反映了实用的理性精神,如果一个神祇能够有求必应,这就是显灵,这就是神灵。如果这个神不灵,他们就会舍他而去,重新去膜拜其他的神。

三、对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的思考

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是汉族移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所致,信仰宗教能够满足他们的精神上、情感上的需要,满足其心理需求。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虽然暴露出多元性和不虔诚性的缺陷,还间杂着跳神、卜卦等迷信活动,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恰恰彰显了汉族信仰的优点,展示了汉族移民信仰的理性。在敬畏之心下,汉族移民有选择地信奉他们需要的神祇,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看似盲目,实际上是在移民过程中遭遇重重艰险、摆脱各种困境时所需要的精神慰藉与心理需求,是汉族移民筚路蓝缕、不畏艰险的精神支柱,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理想,是其精神文化的体现,具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加强了汉族移民群体的认同和长白山地区移民社会的形成。外来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汉族移民的吸收和改造,往往呈现出民俗化的趋势,信仰本身已经融入了汉族的价值理念,神祇也不再是威严冷酷的权威,而是接地气、食人间烟火的体察民间疾苦和倾听人们诉求的引领者,具有了人文关怀的精神。

参考文献:

- [1]珲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珲春市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2]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吉市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493.
- [3]白纯义,修.于凤桐纂.民国辉南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27.
- [4]刘天成,修.张拱坦编.民国辑安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31.
- [5]安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图县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52.
- [6]汪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汪清县志(1909—1985)[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478.
- [7]柳河县志编纂委员会.柳河县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 [8]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边州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6:1761.
- [9]罗宝书.民国临江县志[M].临江:艺文斋,1935.
- [10]通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化县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62—68.
- [11]刘爽.民国吉林新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28.
- [12]王介公,修.于云峰纂.民国安东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27:37.
- [13]田承军.清代东北地区的碧霞元君庙[J].泰安师专学报,2002(20).
- [14]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郑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10.

Foreign Religions and the Lowly Life of Han Immigrants in Changbai Mountain in Modern Times

Sun Yul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134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religions in modern tim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mmigrants, and reflect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 immigrants adapting to the socie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life of Han immigrants in Changbai Mountain area in modern times and their belief in foreign religions, such as Islam, Christianity, Catholicism, and other folk religions, and finds that the belief has common in ethnic feature despit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dern times; Changbai mountain area; Han immigrants; foreign religions

[责任编辑:李清芳]